

萧汉明 著

船山易学研究

华夏出版社

船山易学研究

萧汉明 著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船山易学研究

萧汉明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 印张 192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册

书号: 2484·001 定价: 2.85元

ISBN7-80053-002-7/B001

前 言

《周易》，是在中华民族这块特殊土壤中诞生的一枝奇葩。

它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时闪耀着青春活力的课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又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使人们困惑、苦恼，而又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它带着神学的迷雾与自然科学的光泽、释道的清逸与迁客的愤懑、哲人的深邃与骚人的情趣，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长长行列中行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易学系统，凝聚成为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汉代，是《周易》成书后的第一个易学繁荣期。《汉志》所载为《易》作传的便有十三家，凡二百九十四篇，而新莽及后汉诸易学大家如扬雄、襄楷、郎顗、郑玄、马融、刘表、虞翻、陆绩等等尚不在其列。汉易以注释象数为特征。自孟喜、京房、焦贛《易》问世以后，谶纬神学成了汉易的主要内容，数学、天文、历法、医学与谶纬机祥交织其中，混相生长，从而产生了像《易纬》一类谈《易》的秘书。卦气说，八宫世应、爻辰、纳甲、纳音、互体等诸种说易的思想模式相继出现，并以其独特的思维特征在整个汉代广为流行。而对象数的注释，至于郑玄、虞翻亦愈演愈繁，以致于“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夫之语），汉易因此而走上穷途。

汉易的弱点，被年轻聪慧的王弼窥破。于是他一扫汉易象数学之繁冗注释，提倡义理与思辨，开一代易学新风。他的《周易注》

东晋时被列于学官。唐代孔颖达编五经注疏,《周易》即采用魏王弼注(《系辞》以下为晋韩康伯补注),王弼注遂广为流传,产生深远影响。而汉易则全赖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得以保存。然而王弼注也终因玄学的衰落而渐为习学者放弃,《易》遂转入释道空门。东汉著名道士魏伯阳假《易》畅论养气还丹之术,著《周易参同契》。经过唐代名道钟离权,吕洞宾,至宋初陈抟,《周易》在黄冠术士中广为流传,形成一系列借《易》讲炉火的图表。僭屠也援《易》注佛经,若唐代学者李通玄以《易》注《华严》,别开一番生面。

宋代是易学繁荣的第二个时期。宋初的名儒甚至朝廷要员大都擅长说《易》。如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都提倡以《易》讲义理,启宋代义理易之端绪;刘牧著《易数钩隐图》,则开图书易之先河。自是而后,儒者论《易》成为时尚,而义理易与图书易亦形成两大流派,竞相争高。图书易至邵雍《皇极经世书》问世,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先天河洛学。程颐继王弼“黜象数崇义理”之后,著《伊川易传》,成为义理易的一面旗帜。王夫之在评论《伊川易传》时说:“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周易内传发例》)认为其缺陷在于完全否定象数的作用,尽管明于人事,却不足以昭天道,即不足以揭示自然界变化莫测的奥秘。张载的成功正好在于将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张载的象数,不是整齐划一的先天河洛学,而是阴阳刚柔的升降消长。他的易学启迪于范仲淹,改造和发挥周惇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推进了辩证思维的发展。至于朱熹,则一反王弼、程颐以来通过《易》引伸哲理的做法,强调《周易》为占筮之书。其所著《周易本义》,倡导邵雍的先天河洛学,正文除考订与注释词句外,专言象占,多戒占者之辞。后世儒者讲《易》,倡言邵氏先天之学者尽管不乏其人,然主流仍在程朱后学,即或宗程颐、或宗朱熹,或将二者兼收并储,一直持续到明清之际。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进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农民战争的冲击，清兵入关的刺激，强烈地震动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正是在这样一个雷风相薄时代，易学作为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的一个特殊阵地，又一次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明清之际的启蒙大师们尽管治学各有所专，但对于易学则都进行程度不同的研究。如果说黄宗羲以他的《易学象数论》，向易学中的象数论进行过全面清算的话；那末方以智则以其家学《周易时论合编》，对先天学进行了改造与发挥。至于王夫之这位十七世纪的辩证法大师，则站在时代的高度，纵观了三千年易学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总结了宋易各家的成败得失，选择并沿着张载的易学道路，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易学体系。

二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国主义思想家。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专心从事著述，世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从丙戌(公元1646年，时年二十八岁)始有志于研究《周易》，至戊子(公元1648年，时年三十岁)，避兵戎于南岳莲花峰，益研求《易》理。《周易考异》、《周易稗疏》这类带资料性质的著作大约在这段时间先后写成。至于己未(公元1655年，时年三十七岁)，便开始写作他的奠定体系的哲学巨著《周易外传》。而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曾奔波于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满腔热血而又屡受挫折，直到南明瓦解，才决定“退伏幽栖”(《章灵赋》自注)，以“亡国孤臣之悲愤”，在“志无可酬，业无可广”的情况下，倾心于研究《周易》之道。丙辰(公元1676年，时年五十八岁)，他完成了另一部易学著作《周易大象解》。嗣后数年，又陆续写成《思问录》

内外篇与《张子正蒙注》。乙丑（公元1685年，时年六十七岁），开始作《周易内传》与《周易内传发例》，并于翌年丙寅重定完毕。

从丙戌至丙寅，前后经历四十年，写成易学专著八部之多，至于以《易》说理、评史、论政、言志而散见之于其他哲学、史学、政论、诗文中者，更是不胜枚举。一个人从青年直至晚年，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从事对《周易》的研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王夫之之所以如此重视《周易》，以至于“未尝旦夕敢忘于心”，既非出自感情上的某种偏爱，亦非因于一时一事之用的需要。他于民族危亡之际，未尝不深藏忧患之情，然而他却反对把《易》看作是“不得志于时”而“履忧患之涂”的人所从事的“下梢学问”（《读四书大全说》卷五）；他一生出入于险阻，未尝不有感于《易》教人以“立于易简而知险阻”、“出入于险阻而自靖”这样的“精义安身之至道”（《周易内传发例·跋》），但他认为那种“专以进退存亡之道言《易》”者，只知道“有利用安身之《易》”，而根本不懂得尚有“精义入神之《易》”（《读四书大全说》卷五）。

在王夫之看来，“《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一言以蔽之，“盈天下而皆象”，“《易》统会其理”（《周易外传》卷六）。《易》是对天下万象的最高概括和抽象，是“天地人物之通理”（《张子正蒙注》卷一）。

他说：“《周易》者，顺太极之浑沦而拟其动静之条理者也。”（《周易外传》卷七）所谓“太极”，在他的规定中，就是整个宇宙，即“太极，一浑天之全体”；而《周易》正是对这个整体的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模拟。他把太极及其扩展看作是整个世界物质世界自我运动所固有的内部蓬勃展开，并沿着这个思路建

立了庞大的朴素辩证唯物论体系。

积四十余年治《易》之历程，王夫之用下面的话概括了他的易学特征：“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象爻一致，四圣同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宗”、“象”、“释”、“义”、“用”、“防”，六者是一个整体。其中，“宗”与“象”是王夫之易学的核心，“释”、“义”、“用”、“防”则从不同侧面烘托了这一核心思想。

乾坤并建统宗全《易》，是王夫之易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王夫之认为，“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搯其瑕璺。”而“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广列之，若可施行，而莫知所措”（《宋论》卷十）。在王夫之看来，研究《周易》之道，如果不能把握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统宗，那就有堕入释老以虚无为本的泥坑。他说：“老氏析负抱阴阳之旨，而欲复归于一；释氏建八还之义，而欲通之以圆。盖率以道之中于万者以为大始，而昧其本。则才情之各致，或有相为悖害者，固变化之不齐，而以此疑为不足据，乃从而归并于无有，不亦宜乎！”（《周易外传》卷四）既不可不论“宗”，又不可“虚设纲宗”（《宋论》卷十），这就需要审慎地加以分析。王夫之以乾坤并建为纲宗，于《太极图》有象矣，于阴阳各六有数矣，于乾健坤顺、乾易坤简有德矣。他以浑天大圆之体为模拟对象，使乾坤并建之说牢固地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由此出发，进而探讨六十二卦的错综变化，以模拟万物“动静之条理”，从而展开了他对客观辩证法则的系统构思。

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提出“乾坤并建”的思想，与他后来为

张载《正蒙》作注时详尽阐叙的“絪縕太和”，内涵是一致的。在《正蒙注》中，他明确将太极（或太和）分为“未有形器之先”与“既有形器之后”两种形态，前者无象无形、阴阳浑沦合一，后者则为前者之展开，有形有器，表现为万有之化生。而在《外传》中，他已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云云，解释为太极内部的自我蓬勃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在《周易稗疏》卷三中有一段话也是谈论这个问题的。他说：“太极即两仪，两仪即四象，四象即八卦，犹人面即耳目口鼻，特于其上所生而固有者。分言之，则为两、为四、为八耳。”这里，他认为太极与两仪、四象、八卦，只有合与分的表叙上的区别，实际上是一回事，即合而言之则为太极，分而言之，则为两仪、为四象、为八卦。这时候，关于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的思想尚未形成。与《正蒙注》比较，《稗疏》所云之太极，只是“既有形器之后”的太极。《外传》一出，《稗疏》所云之太极便明显地被纳入到从属地位。他说：“太极者混沦皆备，不可析也，不可聚也，以其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周易外传》卷五）太极被看成是一个阴阳混沦未分而又至足皆备的物质实体。既然有聚而形成器的内在因素，因而不可割裂对待；既然包含了天下的一切差异与多样性的因素，因而不能看作是某种已经成形成器的实物。它只是一种潜在的矛盾形态，一切有待展开的矛盾因素都蕴藏其中，而且只是蕴藏其中，舍此别无他所。因此，太极展开所生出的两仪、四象、八卦云云，本来都是它自身固有的，是它的潜在性的外化。故太极所生之两仪、四象、八卦，亦可合而称之为太极。作《正蒙注》时，便明确将太极分作两种形态，并以体用范畴说明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到《内传》完成的时候，太极一词的内涵已经侧重于“未有形器之先”这一形态上。他说：“《周易》乾坤并建以统全《易》，阴阳之至足，健顺之至纯，太极本然之体也，而用行乎其间矣。”又说：“此太极之所以出生万物、成万理而起万事

者也，资始资生之本体也，故谓之道。亘古今，统天地，摄人物，皆受成于此。”（《周易内传》卷四、卷五）

从体例上说，《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内传》“守彖爻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至于《大象传》，则有引伸而无判合”（《周易内传发例》跋）。体例上虽各有侧重，但思想上则是一以贯之的。《内传》尽管“守彖爻之辞”而“不容有毫厘之逾越”，关键仍在于“体天人之理”，并非探讨与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正因为这样，它与只有推广、引伸而不求判合的《外传》、《大象解》“可以互通之”。

三

王夫之逝世已二百九十四周年了。他遗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王夫之在辩证思维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以及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所处的地位，他的哲学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产阶级加以批判与扬弃的重点对象。解放以来，我国老一辈的哲学史工作者，在对王夫之思想的发掘与扬弃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自六二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以后，王夫之的思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跨过十年的动乱与中顿，党的“百家争鸣”的春风又吹绿了船山学研究的园地。一九八二年天津、湖北、湖南相继召开了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规模一次比一次盛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专著与论文，船山学社重新成立，《船山学报》重新创办，船山学园地呈出一片硕果累累、繁花满枝的景象。

拙著正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期，已经解除了思想禁锢的一大批热血青年，正在如饥似渴地进行着新

的学习与思考，而海外的各种新思潮刚好冲开竹幕汹涌而入，许多时髦的名词概念和思想体系在报刊书籍中出现，并在学人的各种交往中口耳相传。而笔者经过十年动乱，由初期的狂热转入消沉，进而又转入思考，终于在不惑之年改弦更张，匆忙走入这个既是哲学又是史学的领域，希图在这里进行一番深沉的历史反思。而这种仓促上阵，注定了笔者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先天不足：一是没有方法论方面的理论准备；二是对中国哲学史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的陌生。新思潮的传入颇使笔者振奋，但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从众多的新的思想体系中，进行一番慎重的深刻的哲学思考，实现所谓“建构”，“解构”及“重建”的过程，从而凝炼出一套完整的并能熟练驾驭的方法论体系，真是谈何容易！更何况自己面对着一大堆从未涉足过的艰涩难懂的历史文献资料。在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势下，只得一头扎进故纸堆中，首先咀嚼有关的历史文献。至于方法论，只得草草向黑格尔、普列汉诺夫那里张望一眼，又向系统论之类的思潮探探身子，然后，随手采摘些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不露痕迹地装进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之中去。于是笔者便以这种略有变形的现代传统的方法论作为解剖刀与凝合剂，开始对自己从大量原著中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诚实说来，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没有多少新货色，但在原著的研读上，多少花费过一些心血。

拙著初稿写成于一九八二年，得到萧蓬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导师的精心指导。当年九月，内篇部分曾以《王夫之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为题，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得到朱伯崑、方克立二位教授的指点。同年九月、十一月又以之先后参加了湖北与湖南分别召开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外篇部分与《周易内传发例》注疏，一九八四年以《周易内传发例注评》为题，参加了全国《周易》学术讨论会。今年初，笔者对全部书稿进行了重新编排与修订，得到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邓潭洲同志，湖南省图书馆刘志盛同志、陈笑蓉同志和山东大学刘大钧同志的关心、鼓励和支持。此次，蒙华夏出版社不弃，决定正式出版，谨此特向上述各位师友深致谢忱。

此书数年内虽三易其稿，但因笔者天资甚浅，才思驽钝，常恐不足以传先哲之神，有负其期“来者悠悠”之望。书中无知之议、舛谬之注，诚望批评指正。

萧汉明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凌晨于花桥

目 录

前 言	(1)
外 篇	
第一章 易学源流概叙	(3)
一 《周易》“四圣同揆”说	(3)
二 “占——学——占”的易学史观	(7)
第二章 船山易学的特征	(11)
一 象数与义理的统一	(11)
二 象、彖、爻、传的统一	(23)
第三章 论卦象、卦德与卦序	(35)
一 论卦象	(35)
二 论卦德	(36)
三 论卦序	(39)
第四章 论占筮	(52)
内 篇	
第五章 论《易》与象	(63)
一 《易》准天地之神以御象数	(63)
二 盈天地皆象,《易》统会其理	(68)
三 天下无象外之道	(70)
第六章 船山宇宙观的太极模型	(74)
一 太极,一浑天之全体	(74)
二 太虚,一实者也	(76)

三	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	(81)
四	太虚者,本动者也·····	(89)
第七章	太极之为“太和”说 ·····	(96)
一	释“和” ·····	(96)
二	释“主持”与“分剂” ·····	(101)
三	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 ·····	(104)
四	阴阳“全有所任”、“皆有分剂”·····	(109)
第八章	细缊,太和之真体 ·····	(113)
	——“细缊”论发微	
一	细缊者,气之母·····	(113)
二	释“遇”“感”、“摩”“荡”·····	(115)
三	释“机” ·····	(118)
四	中涵者其体,是生者其用 ·····	(120)
第九章	万有之化,流行而成用 ·····	(124)
	——“化生”论管窥	
一	天地之化日新 ·····	(124)
二	“变正”与“变不正” ·····	(129)
三	变通者,阴阳之制 ·····	(133)
四	有常以序时,有变以起不测之化 ·····	(136)
余 论 ·····		(141)
《周易内传发例》注疏 ·····		(147)

外 篇

第一章 易学源流概叙

一、《周易》“四圣同揆”说

伏羲氏画卦，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传》，并非王夫之创说。《汉书·艺文志》综合汉初以来之说，认定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又采王弼“伏羲画卦”，以及马融、陆绩“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之说，从而形成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四圣作《易》说。王夫之除认为《序卦》非圣人之作外，余则一概从之。

至于四圣作《易》之旨是否同揆，北宋时期便已有了分歧。主张以义理讲《易》者，认为四圣作《易》之旨是一致的。若伊川、横渠虽未明说，但于释卦爻辞之际，常将四者融而为一。至于郭雍，则推崇二程、张载，认为四圣之旨一以贯之于“三才”：“包牺象三才之道，文王尽三才之义，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随时之义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犹文王之于包牺也，周公特终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犹称三圣者，以此。”（《郭氏传家易说·总论》）而主张以象数阐《易》者，则认为四圣作《易》，其旨各别。如邵雍便认为伏羲《易》与文王《易》是不同的，前者为先天，后者为后天。他把自己搞的那一套称为伏羲氏的先天《易》。至于南宋朱熹，学宗二程，而独于《易》则推崇邵雍先天之学，认为《易》有先天、后天之别，四圣之《易》是互不关联的。但朱熹并不相信邵雍的那套东西伏羲曾经理